

中西比较文化的 现代开拓者： 阿兰·佩雷菲特

[法]戴鹤白 (Roger Darrober) / 邱海婴



[222/223]

阿兰·佩雷菲特 (1925 - 1999) 是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。他少年俊彦，才学出众。20 岁考上法国四大名牌大学之一——巴黎高等师范学校。翌年又考入法国高级官员的摇篮——国立行政学院。论年纪，最轻，论成绩，处处第一。佩雷菲特十九岁就参加了抵抗运动，从政后一直忠实追随戴高乐将军，先后八次司职各不相同的部长职位：新闻、教育、司法、文化、环境，显示了国务活动家的政治才干。1958 年起当选并连任第五共和国历届

国民会议员，直至 1995 年当选参议员。行动与思想的完美结合在佩雷菲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。他又是一位知名作家，著作等身，不少著作的发行量愈百万，甚至达两百万。在法国文论性著作中实属罕见。佩雷菲特还是资深记者，长期担任《费加罗报》编辑委员会主席。其思维之敏锐，思想之深邃，知识之渊博，文笔之优雅，都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一流作家的行列。而进入法国语言文学圣殿——法兰西学院 (Académie française)——便是对其文才和创作成果的最佳肯定。佩雷菲特还是一位历史学家，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0 年后，又以全票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。

法国语言学博士邱海婴翻译了佩雷菲特的里程碑巨著《信任社会》后，有感于作者的治学严谨，博大精深，观点独到，采访了曾多次为佩雷菲特访华担任翻译的法国汉学家戴鹤白先生 (Roger Darrobers)，与之就佩雷菲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开拓作用、成就远高于一般汉学家的原因、佩氏的中国情结等主题展开了对话。以下是根据两次对话整理的记录。

邱：佩雷菲特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，著述丰硕，立论高远，影响深广。佩雷菲特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。当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，东西方经历了战后近卅载的“断层”，之间的鸿沟尚未填复，关系虽已解冻，但“乍暖还寒”之时，

他便承担起重新开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，而且感召了一批有识之士，如欧洲科学院院士、法籍艺术史与建筑史学家安特·格利勃塔 (Ante Glibota)。1973 年，尚还是学生的他在葡萄牙与佩雷菲特邂逅。佩氏围绕中国将来在世界上的作用，跟他畅谈了三天，使他从此也踏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之路。当中国还是一头“睡狮”，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，被内部动荡和灾难所困扰，被神秘的面纱所遮掩之时，佩雷菲特就把目光移向了东方，用东西方比较文化的大视野，探究中国社会和华夏文明之迷，帮助西方了解并解读中国。正是在今天人们“言必称中国”时，我们才深切感悟到佩雷菲特的远见卓识。倘若仅从时间上讲，还不足以说明佩雷菲特的“先知先觉”。因为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在少数，早于佩雷菲特的也大有人在。但能在中西方重新调整关系，以“和”代“战”，以“对话”取代“对抗”，进入全面相互了解的崭新关系之前，以如此前瞻性的眼光和大胆的预言——尽管套用了 200 年前拿破仑的警句（“当中国觉醒之时，世界将为之颤抖”），宣告中国必会开放，未来之中国必会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人，毕竟他是第一位。佩雷菲特以他的激情预热了今天的“中国热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确实是中西方比较文化的现代开拓者。

戴：是的。佩雷菲特很了不起。我陪他去中国去了四、五次。第一次是 1985 年。中国的确变了。中国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，几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。我本人直到 1991 年对中国能否腾飞还持怀疑态度。佩雷菲特跟我断言他的直觉是正确的。而他在所有人之前预见到了这一切。他高就高在这里。

邱：佩雷菲特的预言性著作《当中国觉醒之时》出版于 1973 年，然而早在此之前的十多年，他就从思想上为这本书做了准备。从佩雷菲特为达尼埃尔·阿贝 (Daniel Haber) 和让·芒岱尔博姆 (Jean Mandelbaum)¹ 所著《中国人的复仇？》一书写的序言看，他 1960 年首次访华时就感觉到中国觉醒的征兆。他虽不是所谓汉学家，但却是个中国通。他对中国的了解、观察和分析远胜于一般的汉学家，成就也远高于一般的汉学家。他不是以一个纯粹的学者和作家，也不是以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来透视中国的。他对中国的解读是多元的，他具备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伦理学、史学的综合修养和奥博的知识，所以能站在相当的高度，正确把握观察对象，形成独到的见解。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秘诀？他看中国，就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他谈中国，就是谈历史、文明、哲学，就是谈发展。他以平等对话的方式了解中国，决无“欧洲中心主义”的偏狭。您是怎

1. 两人均为法国外贸顾问，法国太平洋咨询集团共同主席。